

《人民文学》杂志 与中国当代文学

《RENMIN WENXUE》ZAZHI

YU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欧娟 /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人民文学》杂志与 中国当代文学

欧 娟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民文学》杂志与中国当代文学 / 欧娟著.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 - 7 - 5487 - 3371 - 3

I. ①人… II. ①欧…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8554 号

《人民文学》杂志与中国当代文学

欧娟 著

责任编辑 浦石

责任印制 易红卫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 410083

发行科电话: 0731 - 88876770 传真: 0731 - 88710482

印 装 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 字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7 - 3371 - 3

定 价 6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请与经销商调换

序

——时代大潮与文学精英自律

谭桂林

改革开放初期，是纸媒体走向发达的时代，不管是文学，还是新闻，首先都是通过刊物向社会传播扩散。在这种纸媒体发达的时代里，一般说来，喜欢文学的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心中都会有几本印象深刻的刊物。如果要我来回忆一下那个时代最喜欢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肯定是其中的一本。这倒不是因为它的宏大的名号，也不是因为它是国内顶尖级别的文学刊物，而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这本刊物曾经留下过实在难以忘怀的印痕。记得大概是在1976年的下半年，我从下乡落户的茶场借调到了公社的文化站做辅导员，参加了几次地区和县里的业余文学创作的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认识了一个诗人。他是铁道兵出身，在部队时是通讯干事，写过不少的诗，复员后回原籍，做了公社文化站辅导员，是县里业余作者讲习班的台柱子。他有一本厚厚的剪报本，把自己在各个报刊上发表的诗歌都剪下来按照先后时间顺序贴在本子上，这个剪报本总是被带在他身边，时不时要拿出来朗诵几段，令我们那些刚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文艺青年崇拜得不得了。更有意思的是，和这个剪报本一起被带在身边的还有一本刊物，它就是《人民文学》，上面登载了他新写的几首短诗。是哪一期我

忘记了，这老兄的名字现在也实在记不起来了，但他从军用书包里拿出这本刊物时的那种虔诚和骄傲的神态，至今还历历在目。后来，我自己读上了中文系，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位老兄为什么舍不得把自己的作品从《人民文学》上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去的心情了。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作品可是一个作者一生的梦想，这老兄在部队笔耕数年，最终还是回到农村，虽然到了公社做了一个吃工分的干部，但怀才不遇的心情是挂在脸上的，所以经常把刊物拿出来摩挲一下，观赏一下，也是对自己的一份安慰和鼓励。

上大学的第一年，我正赶上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那正是“臭老九”刚刚翻身的时代，《哥德巴赫猜想》不仅让年轻人们真正见识了所谓的“臭老九”都是什么样的人物，而且通过对一道数学上的世界难题的解答，掀起了国人热爱科学从事科研的高潮，这就是文学的感人力量！当时我们班上的同学，有不少入学前曾经担任中学教师的，谢慧敏这个人物形象更是引起他们巨大的兴趣。那时学校订阅的刊物份数少，同学们为了节约经费，各种刊物也是分头订阅，然后轮流传阅。登载这些篇目的刊物，自然在同学们手上争相传阅。已故老友吴康教授曾把20世纪80年代与五四时代相比较，称之为文学的时代。现在想起那时等着阅读刊物的焦急的心情，读完作品后在寝室里的热烈讨论，文学时代一词真是实至名归。《人民文学》无疑是这个文学时代里最撩动人心的一本刊物，后来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不仅在文学阅读中，而且在全国社会各界引发的轰动，更是一本文学刊物能够到达的最高荣誉。至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某篇作品而导致整个刊物回收，编辑部领导撤职，读者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去寻找漏网之鱼来一读为快，这事件中间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而读者面临这种事件时的那种莫名兴奋与紧张，恐怕也是终生难忘。这些年来，做刊物研究的博士论文多了起来，但在欧娟博士做论文的时候，选取了一本当代刊

物做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还几乎没有先例。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人民文学》在导师们心中的独特分量，因为这本刊物在导师们的文学生命中刻印下的种种痕迹，所以才那么爽快地通过了她的选题。至少，我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当代文学已经经历了将近70年的发展，为当代文学叙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学理化。学术界也有一些先行者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有的编写史著，试图先行建立一种史的体例与规范；有的做年谱或纪年史，试图为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车轮留下辙印与轨迹；有的做资料长编或汇集，试图为史的编著垫下基石，打好基础。刊物是文学生产的主要载体，对这个载体的深入研究当然也是当代文学史立史的一种必要的工作，这可以从现代文学学术界对《小说月报》《新青年》《新潮》《沉钟》等刊物的研究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密切关系上得到验证。当然，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在历史撰写上有所不同，当代人治当代史，不仅资料容易查找，而且对时代的环境氛围有切肤之感，不容易拉开心理距离，而当代人对当代资料的研究就更不受人重视了，所以有学者对当代文学史的立史工作包括资料整理总抱有一种怀疑态度。我认为当代文学立史和当代文学资料整理是十分必要的，必要之处恰恰在于即使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呈现在那里的文学资料，也未必就是真实的东西，也许背后就潜藏着一些目前不能见人的秘密。当代文学学者的立史研究和资料整理研究，宗旨就在于还原这种真实，就在于揭开这些还未示人的秘密。在这一点上，《人民文学》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严格管控的刊物，同时又是国家文学精英聚集荟萃的地方，或许体现得更加突出。欧娟的博士论文一方面充分注意到了这本“最高的国家文本”在各个时代引领文学潮流的历史轨迹，一方面也深入地发掘出了每个时代主编和编辑的文学理念在历史大潮中的主体性作用的潜隐发挥。全文通过各种事实的披露，各个问题的探讨，让读者认识到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管控和文学精英主体自律这二者之间的博

奔，才成就了《人民文学》数十年的辉煌。读完这本论文，再想想《人民文学》创刊之后发表过的那么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所谓“毒草”的作品，想想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文学》在自己的生命中打下的那么深刻的烙印，就不能不为欧娟博士的这个研究成果感到信服了。

欧娟博士是已故著名学者罗成琰先生的高足，河南姑娘，从中原腹地读完硕士，来到湖南工作，又在岳麓山下攻读博士，成家立业。她与典型的北方姑娘有点不一样，说话细声细气，做事细致认真，给导师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罗成琰先生是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点的开创人之一，2001年他从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任上调到湖南省文联任党组书记，后来又高升至中国文联任职，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参加学科里的一切活动，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时，我还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罗成琰先生有时因为工作忙，而学生的各种表格教务管理是说要就要，不得延误，所以，罗门弟子中的许多人的各种表格不少是我代他签名上交的，与罗门弟子之间的交往也十分密切。罗成琰先生从教20多年，培养的硕士博士遍布全国，这些罗门弟子牢记师恩，不负师望，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就。欧娟博士可以说是罗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之一，现在她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这对她当然是一件好事，对四年前积劳成疾英年去世的导师也是一份宝贵的纪念。所以，欧娟博士打电话来嘱为作序，我虽然对这个课题缺乏研究，也勉力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欧娟博士这份信任的交代，更是借此对已故的兄长般的友人表达一份深切的祭奠之情。

是为序。

2018年8月20日写于广州旅次

（作者系著名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前 言

从开始关注并研究《人民文学》杂志到现在已十五载有余。从懵懂的学生时代到几近不惑之年，《人民文学》杂志给我的生命留下了深刻的印痕。2005年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的时候，我选择这个课题作为我的研究主题，并于2009年顺利通过博士答辩，参加答辩的专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肯定，这让我稍稍有了点信心。这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而成的。

这一课题，实则是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一次难得机会。希望此研究可以使我对《人民文学》杂志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

《人民文学》杂志贯穿中国当代文学的始终。20世纪中叶创刊的《人民文学》被赋予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使命，在中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波诡云谲，政治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演变趋势，都使当代文学具有了不可阻挡的魅力。《人民文学》几乎参与了当代文学的所有事件，经历了全部的繁荣、挣扎、痛苦和彷徨，不断衍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而这些生

长点并非学人们赋予，而是与生俱来。

20世纪以来，面对不断变革的社会现实，《人民文学》适时推出了“底层叙事”和“非虚构文学”，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当代文学研究一度成为显学，很多富有才华的学者到这里安营扎寨，开辟了诸多的学术生长点。但是近10年来，随着文学影响力的逐渐下降，政治对文学的关系不再呈现出如影随行的紧密性，甚至开始与文学逐渐脱钩。市场经济把纯文学的领地侵蚀殆尽，消费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人民文学》的读者群体萎缩，受众日益减少，昔日的国刊开始尝到了被挤向边缘的苦涩。当代文学研究的道路该怎样走下去？现实需要我们做出回答。

历史总是在背景置换中不断重演，反思历史，从历史中总结成败得失，也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为未来点燃希望。《人民文学》从创刊到现在将近70年，这70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70年，是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70年，也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朽的70年。站在新的起点上，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学人，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们有责任把它进行整理和总结。

现在对《人民文学》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其不利之处在于，这个时代刚刚过去，我们离研究的时代太近，甚至是置身其中，无法真正客观地看待其成败得失，无法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这个时代却要把这个时代作为研究对象，这是最大的挑战。即使是站在山下，但距离山太近，同样无法看到山的全貌，因此对有些问题很难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

离得近也有好处。历史的烟尘常常会湮灭很多的事实和细节。我们经常只能在别人的叙述中审视历史，或者在无凭无据的臆想里揣测

过去，而实际上，任何想象都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或者自娱自乐的游戏。身处当代，我们要比后人看得更细致，有些切身的感受，也因为身在当代才能够体会到言说者的言外之意和沉默者的弦外之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身处当代的我们有不可取代性。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阶段。革命历史风烟散尽，市场经济方兴未艾，中国梦起航远行，《人民文学》和其他文学期刊一样，都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怎样走？在爬梳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人民文学》的中枢地位和标本性价值，于是一路走来，遂毅然决然地把“《人民文学》杂志与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研究的课题。

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期刊史有联系，但其两者的着重点不尽相同。当代文学史主要研究作品的生成背景、生产机制、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以及作家的思想感情、创作动机、思潮的形成原因和长远影响。而文学期刊的历史则有着自身的内部系统，包括编者、作者、读者和作品，着重从编者的视角出发，研究现象的生成原因和内在肌理。文学研究从方法来讲，包括细读、批评、欣赏等诸多方面；就目的而言，有探索思想的真谛、艺术的奥秘，乃至微言大义和故事原型等不同的追求。因此所谓“文学期刊研究史”不仅仅要关注期刊的文学性批评与理论上的概括，而且要关注“编者按”和“读者来信”等实证性研究。它与当代文学史有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内容，以不同的方法探讨和总结各种文学现象、思潮和编辑理念的演变轨迹。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对近15年来《人民文学》的学术成果加以通盘的梳理，按照历史演进的不同节点，描述其演变大势，找出共性规律，以有利于读者的思考。

70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其间《人民文学》上刊载的作品可谓蔚为大观，对《人民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如汗牛充栋。

“《人民文学》杂志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是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的，研究路数也是多元化。其中既有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和观点，也有中国传统文论的核心理念，并努力摆脱对《人民文学》研究的庸俗化、教条化倾向。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不同部分的研究成果是不平衡的，展开有舒有缓，成果有多有少，涉及的范围有广有狭，探索的问题有深有浅。但总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史实在先，作品为基，有发展的观点；既重史料，也重史论；既有概念厘定，也有文本细读；既有理论铺垫，也有评论分析；既有选择地解剖作家作品的研究，更致力于梳理研究大势的轨迹；不做简单的史料罗列，以期深层次研究《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当我们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人民文学》70年潮起潮落的基本事实之上，对其进行具体细致的梳理时，将尽力避免任何情绪化的浮躁、个人化的喜好和局限于一隅的偏狭，这样才能最大可能性地研究这段居于其间的历史，对它做出深刻的认识和恰当的定位，总结出70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未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填石铺路。

文学期刊研究一般都与特定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文化风尚等密切相关，与时代之精神、文化之变革自觉地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往往使学者文人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这也与《人民文学》自身的政治属性相契合，因此很多关于《人民文学》的研究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忽视了杂志的审美属性和艺术追求。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后，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已成为一种思潮。如章太炎、陈寅恪等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早已被大多数学人淡忘。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力主治学要“通经致用”“明道救

世”。他反对掉书袋式的学术研究，并为学术研究设定了特定的价值归宿和学术实用性，“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70年总的来说，经历了一穷二白、大搞建设、阶级斗争到改革开放、和平崛起，其间编辑和作家们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感召，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用先进的社会思想装备自己，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精神的宽广，体现了文学期刊的积极的社会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后，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给《人民文学》指引了新的方向。《人民文学》发掘社会需求，将底层叙事和非虚构文学推向新的高度，应该说功莫大焉。

创刊初期的《人民文学》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热情高涨，大多数自觉地进行主动适应、思想改造，调整了思想观点，将文学创作纳入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去。对于新生的时代来说，需要统一思想来巩固政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教条化、庸俗化，加之特定社会背景的限制，有些做法本身就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精髓，违背了文学自身的运行规律，使《人民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给很多作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文学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现在，我们在反思和总结《人民文学》将近70年的发展历程时，不能从过去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文学审美性与社会责任感割裂开来，涌动起一种否定社会责任而无限张扬艺术属性的思潮。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说：“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己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

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歿，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飏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①而仅仅从政治与《人民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无疑又是逆时代进步的潮流，与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违背。

王国维曾说，“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追求学术的独立品格。章太炎也主张“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这些观点深深影响了我。他们潜心学术，不计名利，深耕所学，成绩斐然。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保持“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从纯学术的立场出发，蔚为大家。

当我们在回顾《人民文学》发展历程时，冷静地联系将近70年来的实际情况，将各种关于《人民文学》研究的成败得失，放在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两个维度交叉构成的坐标上考察，才会对其价值和意义做出比较客观的评定，才会对现在及未来的研究提供可借鉴性的思路，才会让研究成果不会因时代环境的差异而产生隔膜。

在社会趋向稳定有序、学术环境也将更加宽松平和的当下，我们的研究更不能放弃它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之前所有学人的成果和思路，以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伟大精神，都应该在新一代学人身上得到新的继承和发扬。

关于文学期刊的研究，大致说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融合了统计思维的思路，将大数据思维和统计方法纳入文学期刊杂志的研究当中，注重分类和分析；另一类则是印象式的论评，包括对期刊内容的品评及批点、杂论等。融合了统计思维的研究，在多学科融合、大

^① 陈寅恪. 寒柳堂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76.

数据思维盛行的环境中，其声势逐渐壮大，单一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在开放的当下经受了严重的冲击、解构与新变。文学期刊研究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多学科交叉运用和开放型研究的形成和发展上。它不断生根与发展，在吸取其他学科的血液化为新生力量的过程中，促使了中国文学期刊的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综合，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两种不同思路、不同形态的方式方法，分别在文学期刊研究进化的过程中，相互融合，构成了当前文学期刊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

原有的文学期刊研究所用的基本理论、范畴、方法、形态与文学期刊一样，是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两者可谓是同质同根，所以它们理所当然地容易契合。对文学期刊采用统计思维和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研究的思维，开创了一系列新的范式，推进了文学期刊研究的现代化，且的确在许多方面能更好地解释文学期刊发生的各种现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与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研究对象毕竟不是同质同源，从而难以达到一种融为一体的境界，甚至会产生理念为先、结论为先，为了论证结果削足适履、牵强附会的现象，导致论证过程与论证结果表面上一致、本质上却格格不入的情况。

直到多年以后，面对《人民文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可能会猛然觉得，在文学期刊研究中已经失去了传统的话语，患上了“失语症”。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当下评析文学期刊研究的基本范式、理论体系、表述方式与阐述话语已经不是传统的了。

《人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很少赋予整体以宏观研究，更多的情况下是就某一类问题、某一段时期、某一种文体、某一个主编、某一种倾向来加以研究的。人们的视野往往集中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一个个热点。一个主编、作家、作品、现象等被普遍关注的问题，往往吸

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在反复耕耘。另外，一些能够反映普遍性规律、映射方向性节点的细小问题，往往不为人们所关注，或有个别学者提及了，也得不到一定的响应。本课题试图将两者进行结合。这种失衡的偏颇，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一般说来，大问题之所以能形成热点，皆由热点自身的内在吸引力所决定的。那些经典作品的精神含量深厚、审美价值极高，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元素，人们多花点力气在这里钻研，丰富当代文学的维度，也自有其必要性。历史往往是公正的，经过历史的过滤，一些作家作品逐渐被遗忘，确因其自身无太大的价值。但是作为文学期刊研究，它的专注点应该是期刊本身，而不全是刊载文章的内容和思想。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发现作品价值与期刊作用之间的逻辑性关联。

我们研究《人民文学》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是什么？我认为主要还是：一厘清本来面貌；二为未来所用。之前的《人民文学》研究成绩斐然。上述两种研究思路各有短长，它们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数据而轻大道，重微观而轻宏观。我们应该承认两种研究都有价值，谁也不能否定谁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改进中国文学期刊研究的出路，并不在于哪种思潮占了上风，而应逐渐深化我们对于文学期刊本身在使命、价值、方向等方面的认识，扬弃各种研究思路的短长；如此，将有益于文学期刊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接下来，我重点阐述一下本研究的内容和思路。

创办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人民文学》是当代文学期刊的代表。作为中国作协机关刊物的《人民文学》彰显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人民文学》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权威，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和规范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深刻地影响和真实地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

形成和发展。本书选择《人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当代文学为背景，对《人民文学》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进行整体观照和细致梳理，通过对《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内在关系的深层探讨，以期从《人民文学》这一窗口探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变迁。

本书的正文部分由六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是对《人民文学》的历史回顾，分析《人民文学》的创刊背景与角色定位，并梳理《人民文学》三个时期的发展历程。第一时期（1949—1966年），从主流叙事与另类话语并存、百花文学的昙花一现、自我调整后趋同主流三个阶段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前《人民文学》的发展历程。第二时期（1976—1989年），从“文化大革命”余绪的逐渐过渡、新时期文学的一一亮相、自由化思潮的间接影响三个阶段来梳理《人民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发展状况。第三时期（1990年至今），从试图淡化的意识形态隐性存在，游离于主流、精英与大众之间两个阶段分析新世纪《人民文学》的发展变化。此章节通过梳理《人民文学》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为从《人民文学》角度透视当代文学的演变历程打好基础。

第二章从编者主体、作者个体、作品载体、读者受体四个层面来分析《人民文学》的构成要素。徘徊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编者、过于强调自己的政治姿态的编者、“编者按”与“编后记”的隐性表达是构成编者主体的三种类型。作者个体分为两类，即顺应时变的主流作者与夹缝中生存的“另类”作者。符合主流文学规范的主旋律创作与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文本两种话语形态的并存是作品载体的真实状况。读者受体加强、规范了文艺的合理性，可通过假定读者的理想构造与“读者来信”的深层意义来实现。

前两章是对《人民文学》主体的考察，后四章是在此基础上对《人

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内在关系的研究。

第三章从“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情结、“为民请命”与“为民代言”的实用主义、文化启蒙与教育功能、宏大叙事与理想主义、“替代性满足”或自娱自乐五个方面论述《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特征。

第四章主要分析《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气质。具体表现在底层视角与平民意识、来自民间的草根精神、集体神话与典型人物的励志性、深沉的忧患意识、时代镜像五个方面。

第五章是对《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取向的探讨。博大、真实、生动的现场感，庄重、厚重、高蹈的主题，明晰而硬朗的叙事风格，壮美为主、柔美为辅的审美追求，格调清雅、气韵生动的文本意境是其审美取向的五大侧面。

第六章是《人民文学》的世纪转型。进入21世纪之后，《人民文学》开始积极转型，在编辑理念、内容选取等方面都与之前截然不同。之前的主编茅盾、刘白羽、丁玲、艾青、刘心武、王蒙等人都是作家，从21世纪之后，李敬泽、施战军等人都是批评家，这对《人民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编辑理念发生了三大变化：从宏大主题到微观生活、从重视名家到扶持新人、从关注圈子到关注大众。从内容和主题来讲，主要有两大变化：高举底层叙事和非虚构文学的大旗。底层叙事体现出对象的多样性、体验的现实性、情感的真实性、命运的悲剧性、意蕴的多重性，非虚构文学则呈现出贴合读者的审美趋势，并重置了文学的虚构边界、融合“大时代”与“小世界”，人民文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不再是享受苦难、担当苦难、以苦为甜，而是表达人民生活的多样性和反映人民生活的深刻性。

本书以《人民文学》杂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缩影和切入点，从微